



变文传播研究

胡连利◎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敦煌

变文传播研究

胡连利◎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孙兴民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变文传播研究/胡连利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01-007604-1

I. 敦… II. 胡… III. 敦煌学-变文-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0798 号

敦煌变文传播研究

DUNHUANG BIANWEN CHUANBO YANJIU

胡连利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永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604-1 定价:2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文学传播研究的意义	(1)
第二节 变文传播研究概况	(5)
第二章 “变文”的称名及渊源	(11)
第一节 变文的称名	(12)
第二节 变文的渊源	(21)
第三章 变文的传播背景	(33)
第一节 佛教讲经的历史回顾	(33)
第二节 佛教在唐代的世俗化趋势	(47)
第三节 变文传播的时代背景	(65)
第四章 变文的传播者	(73)
第一节 俗讲僧人	(73)
第二节 民间艺人	(82)
第三节 变文传播者的价值	(84)
第五章 变文的传播内容	(90)
第一节 变文的题材	(90)
第二节 变文的思想	(92)
第三节 变文的艺术特点	(106)
第六章 变文的传播媒介	(116)
第一节 变文的文字媒介	(118)

第二节 变文与变相	(122)
第三节 变文的仪式	(131)
第四节 面对面媒介	(139)
第七章 变文的传播对象	(143)
第一节 宫廷受众	(143)
第二节 文人受众	(154)
第三节 民间受众	(169)
第四节 变文受众研究的传播学意义	(174)
第八章 变文的传效	(180)
第一节 变文传效的界定	(180)
第二节 变文的传播区域	(183)
第三节 变文的演出地点	(192)
第四节 从文学意义上看变文的传播效果	(199)
第九章 变文传播的意义	(224)
第一节 变文传播的文学意义	(224)
第二节 变文传播的文化意义	
——以唐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心	(236)
第十章 余论——变文作为文学样式的式微与消亡	(251)
参考文献	(262)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文学传播研究的意义

文学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整个生存活动而发展,人类对文学活动的认识与研究也在不断地展开、深入和丰富。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路径,主要着眼于作家和作品研究以及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实质上也是作家和作品研究的扩展和延伸。随着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学科理论的深入发展和被广泛接受,人们逐渐对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价值的实现过程有了新的认识。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艾布拉姆斯的“四因素论”,即文学活动是由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个因素及其关系构成;文学研究应该是文学整体活动的研究的理念正在被广泛接受。文学作品不再被认为是静态的物化的存在,而是动态的、观念化的存在。文学作品从产生到其价值的最终实现,逐渐被看成是一个经过创作——传播——接受三个阶段的过程。由此,文学史的研究,也应由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

但是,目前学界对文学活动系统中各个环节的研究仍然是偏于静态的关照,特别是对文学传播这一环节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实际上,文学传播在文学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传播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必要的、无处不在的人类活动,可以说是与人类

社会同时存在的。文学传播作为文学现象,更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文学传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活动的发展演变。文学史上每一个作家和每一部文学作品,从创作目的到文本产生、再到被接受和流传的各个阶段可以看作一种传播现象和过程。文学发展的进程就是文学传播的历史。文学样式的演进与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文学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变革都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的质性及其发展方向。文学传播也是文化传播的一部分,从传播的角度研究文学亦是文学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着眼点。本书也将以这种新的研究方法作为尝试。

首先我们要明确传播的定义。作为学术概念的传播是多义的。词源学上,它具有信息的分享和传递两方面的含义;就人文和社会科学而言,传播是个人和团体主要通过符号向其他人和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和感情。^①一般来说,传播是由传播者、媒介(信道)、内容(信息)、受众以及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效果、传播发生的场合、信息所涉及的一系列事件组构而成的,也就是传播学上著名的“5W”所概括的传播模式——传播者(Who)、内容(Say What)、媒介(What Channel)、受众(To Whom)、效果(What Effect)——在一定的“环境”中的实现。传播是一个流动过程,因此它呈现着动态且复杂的特征。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也遵从了上述理论规律和实践表征。

将传播学的“5W”模式对应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可以发现,古代文学传播由此可大体分为两种传播体系,即文人传播和民

^① [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间传播。^①在传播者上有文人传播者和民间艺人传播者之别;在传播内容上有雅文学和俗文学之别;在传播媒介上有文字书写文学和口头说唱文学之别;在受众上有文人受众和民间受众之别;在效果上有文人传播效果和民间传播效果之别。当然,这两种文学传播体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有所交融的。例如很多文人是民间文学的受众,甚至他们有人也从事民间文学的创作和改编;而有些所谓的雅文学也有很多民间受众,等等。在传播目的和方式上,两种传播体系更是有许多相同的因素。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区分是就文人和民间两种传播体系的主要差别而言,且这样的区别有利于更加清楚地了解古代文学传播的现象。

以往的文学传播研究,对于文人传播体系各个环节的研究较为深入,对民间文学传播体系的研究则不够系统。然而,文学本身和文体都产生于民间,恰恰是民间文学的传播最能完整地体现整个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文体演变进程。在这个问题上,王小盾先生在《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中曾有相关论述。他认为,如果给中国的文学一个最狭义的界定,那么文学就是诗歌韵文了。这最狭义文学的本质恰恰就是民间文学所能体现出来的。因为韵文最初出现就是为了便于记忆吟诵,而那个一直被遗忘在通常涵义里的中国文学史之外的民间的文学世界,它使用的则正是这种便于记忆吟诵的口传方式或表演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民间文学(讲唱文学)与作家文学(书写文学)的关系是本与末的关系。但是,精神的选择须接受客观条件的制约,由于历史文献的相

^① 古代文学传播体系中还包括官方传播,以及相应的官方传播者、官方受众、官方传播效果。因官方传播和文人传播内容与形式很多方面相近,又与民间传播有显著差别,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官方传播可归入文人传播中,亦可分别出来,本书此处将官方传播归入文人传播中。

对偏少,文字记录对视野的限制,以及过去研究中文士主义批评的传统文化心态,理论观念的狭隘性等影响,作为源头的民间文学总是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当文字的出现部分地取代了韵文这一功能之后,就开始出现了各种文体的变迁。中国古代韵文体制的变迁,总是表现为发端于口传文学而确立于书面文学的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言语类的传播方式创造韵文体裁,文字类的传播方式则确定其规范和权威。在这个论述基础上,王小盾认为,传播是关于文学最重要的概念,因为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传播过程的结果,文学的历史就是传播的历史——“如果说每一种诗体都有其物质承担者——例如瞽蒙之于诗、行人之于楚辞、歌咏乐工之于乐府、后庭伎人之于宫体诗、梵呗之于佛教歌赞、歌舞伎之于曲子辞、书会艺人之于宋代讲唱,那么,韵文的历史便可以理解为表演者或传播者的历史。只有从传播方式的角度,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这一类关系,进而正确认识文学体制的变迁,看到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①

变文的出现和演变也可以作如是观。作为一种言语类的文学,变文的传播方式创造了后世众多的韵文体裁;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形成文字类文学。于是,变文无从获得一种必须的规范与权威,在传播方式的角度来看,变文的式微是必然的。因此,变文的传播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具有文化意义。变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有其内部的传播模式;变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又体现着外部的文化传播的特征。在这里,我们就要从这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来综合考察变文自身的传播特征以及其体现的文化的传播特征。本书选择变文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基于变文所

① 参见王小盾:《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属的民间说唱文学的性质所具有的文体意义以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在文学传播史上具有的独特意义,由此探讨变文的传播所反映的文化意义,进而以变文传播研究为坐标点,进入对古代文学的传播的系统研究。

第二节 变文传播研究概况

变文的研究是敦煌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大批著名学者参与其中,经过近百年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绩。有关变文研究史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考的著作和论文不少,不再赘言。^①其中,变文研究可基本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变文的整理、校勘和注释。对变文写卷的整理、校勘和注释是变文研究的基础。校勘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无疑是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由王重民等6位研究者编校的《敦煌变文集》,80年代出版的台湾学者潘重规先生的《敦煌变文集新书》和90年代出版的由黄征、张涌泉先生校注的《敦煌变文校注》。每一本书都是编著者在对此前学术界已有相关成果充分吸收和继承的基础之上的精心之作,代表着当时学术界整理的最高水平。注释方面,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最具影响力。项楚先生的《敦煌变文选注》和一系列变文校注方面的高质量论文,也是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学术界对变文所做的高水平校释,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对于变文的引用和释义也大都

^① 参见高国藩《敦煌变文研究的进展》,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7年版;林家平等《中国敦煌学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之言《七十年变文研究》,《古籍整理学刊》1990年第4期;张锡厚《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回眸》,《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来自于上面几部经典文献。

二、变文文体研究。包括变文文体的称名、渊源、分类、辨体、对后世文体的影响以及变文与变相等宗教艺术之关系等问题。因为关系到变文文献范围的确定等研究中的最基本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变文研究的开始时期,这一问题就成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对变文的称名、渊源、分类、辨体等问题的探讨,敦煌文学研究者一直都倾注着很大的热情。几乎每一位变文研究者都对这些问题提出过一些自己的看法。然而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局限和对有限资料的不同理解,研究界对此见仁见智,这一问题成为变文研究中一个长时间困扰人们的难题。除了基本的文献研究之作,变文作品研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变文的称名及渊源等问题。只要是变文研究的专著,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和学术界关注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中存在着诸多歧见而难形成学界定论。本书为便于所论问题的探讨,也将对变文的称名及渊源做一综述。

三、变文具体作品的研究。包括具体作品题材的溯源、演变、创作时间以及表现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有专文对其题材的溯源与演变的研究作出探讨,有的作品甚至有多篇文章论及。^①

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研究,但相对于以上三个方面,成果相对较少,而且零散。由此可以看出,近百年的敦煌变文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敦煌写卷的特殊性质,使得敦煌变文的研究一直以基础性研究为主,研究方法也略显陈旧。目前变文研究的一个

^① 参见富国平:《变文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南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重要缺憾,是对变文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独特之处的忽视。这些独特之处有变文作为俗文学的通俗特点、作为说唱文学的表演性特点、作为民间文学的集体性特点和口传性特点以及作为宗教文学的文体特点等。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变文研究者将变文研究与传统文人案头文学的研究方法等同,仍然按照作家作品分析的方法对变文进行研究,仍然以文人案头文学的评价体系来评判变文的文学价值。这样,在变文的研究中,就存在着以今天的文体观念去划分变文类别;忽视其独特性质,与一般的文学作品相等同;忽视抄写的实际,把抄手根据各自需要、不同目的抄写的作品当作一般的类似于作家直接创作的完完整整保存下来的作品;把本来并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仅仅由于特定的历史机缘而流传下来的一种综合性艺术的一部分(仅仅说唱的部分,也许还是说唱部分的部分)与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或社会、文人有意识的“藏之名山”而传承保留下来的艺术作品相等同,等等。由于在研究中存在着这些不同程度的混同,所得结论自然不尽合理。同时,对于变文的评价问题,研究者也往往局限于变文的文学价值或者俗文化价值,忽视了变文作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过程中的文化产物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由此看来,对变文的研究必须突破传统文学理论的窠臼,针对变文的民间性、口传性和文化性的特点,采取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如上节所述,文学传播学作为文学研究的新角度,在民间口传文学的研究中可以更加还原其本来的动态特点。但是,目前学界对变文从文学传播学角度进行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惜未见到,仅有个别专著涉及敦煌文学的传播性,或者对变文在文学传播史上的地位稍做论述,兹列如下:

高国藩先生的《敦煌俗文化学》论及敦煌俗文化的特点时,将

“传播性”列为敦煌俗文化的五大特点之一(其他四个特点为民众性、民族性、实用性和神秘性)。他认为:

这种“传”的特点,贯穿在敦煌俗文化学的一切作品中,文化的信息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传达给不同的人。敦煌民众通常运用口耳相传,口头到书面或反之由书面到口头相传,还有相同模式的传承与延续,以这三种不同的“传”之渠道来传递文化的信息。

敦煌俗文化学研究的重点,就是它的传播性,这中间大有学问可做,这就是西方所说的“传学”(communication),即研究敦煌人與人、人与他的宗教或社会的团体之关系;研究人怎样受佛、道、儒的影响,又如何互相影响;研究人怎样运用不同的文化形态来报道各人的思想信息,接受祖国文化渊博的知识,如何在教育自己和反过来教育别人,自己怎样娱乐和消遣,而又怎样去娱人。总之,借传播性而深入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传播之中的传承,很值得我们注意。敦煌民间的每一种俗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同整个西域和我国其他地区的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多种俗文化在流变过程里都有着与其他区域的俗文化,有相似的或者相同的形式和内容,具有内部的继承关系,在它们继续流传的线索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民族在敦煌甚至可以扩大到整个中亚的历史概况、环境风貌、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①

该文注意到了敦煌俗文化学(其中当然包含敦煌变文在内)的传播性,并认为应作为敦煌俗文化学研究的重点,见解独到,惜未作进一步探讨。

另外,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概论》一书论述了敦煌文学的

^① 高国藩:《敦煌俗文化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6页。

传播途径。书中将敦煌文学的传播途径分为口头传播、题写传播、抄写传播和刊刻传播四种。书中认为变文等讲唱文学作品属于口头传播,传播场所主要有寺院的讲唱、官衙斋会、私家和社众功德会、全民性节庆活动、军中文娱活动和化缘僧唱募活动等,接着还论述了口头传播和抄写传播的特点,并对二者做了比较。书中说:口头传播属于开放性的、声像兼备的直观传导。它的长处是普及易懂、雅俗共赏。不论识字与否,不论眼亮目盲,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接受、可以欣赏。但这种方式也有它的局限性,主要是声像一发即逝,时效短暂,当时没有录音录像技术,不可能长久保存,所以当时流传口耳的讲唱作品无一能够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敦煌讲唱作品,只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极少量的一部分。这部分作品,严格地说已经变成只供识字人通过阅读而加以欣赏的书面文学作品了。抄写传播的长处是可以打破口头传播无法摆脱的时空局限;短处是接受面大大缩小,仅限识字者才可以欣赏,另外由于风俗及语言的变迁和文字讹脱衍误,给后世阅读理解也带来一些困难。^①

该书对敦煌文学总的传播途径和方式做了归纳和分类,但仅限于此,未从其他方面继续传播学角度的探讨。

在一些传播学专著中,也有对变文作为一种特殊文学样式的传播学阐释,但都失之于简单,不成系统,对于变文传播的文化意义也未作深入分析。^②

基于上述对变文研究和变文传播研究现状的认识,我认为应

① 参见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参见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第二章 “变文”的称名及渊源

公元1900年(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中国西北边陲小镇甘肃敦煌一个石窟中,大量千余年前的遗书被道士王圆箴意外地发现了。遗书的总数近5万卷,大约在公元11世纪由于战乱被封存。此后,在长达800多年的时间里,它们被历史的风烟湮没,无人知晓。^①随着这些包含中古时期宗教思想、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丰富资料的重见天日,一种在以往文学史家的视野里从未出现过的文学样式横空出世。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这才发现,我们的文学史遗漏了一种曾经多么广泛影响着当时社会、又成为后世众多文学体裁渊藪的重要文学样式;我们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曾经长期聚讼不已的公案,诸如词的起源、话本小说的起源、宝卷的起源等也因此得到了完全或者部分的解决。这一文学样式,目前的通名是“变文”。这一称名最初是由郑振铎先生于1929年刊文提出的。^②此名后来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人们整理此类文学作品集也都以“变文”冠之。^③但是,随着变文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以“变文”作为这类俗文学作品的通名,其概念的内涵是很模糊的。与此相关,“变文”应如何定义,其渊源是什么,如

敦煌》;文研日,其译同熟,《新小辞源及新辞源之附编》;董国王 ①

① 敦煌遗书的总卷数以及何时因何种原因被封存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论,此处依照通说。平 1901 会考式本,本明僧力更案上,《敦煌》;王 ②

② 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3号(1929年)。《敦煌》

③ 如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等。平 0201) 本 5《19 集 19 变 19 言

何分类等等,这些都成为敦煌俗文学研究者一直探讨的问题,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的看法。研究者们已经意识到,敦煌讲唱作品名称、体制及分类问题的研究,不单单是个名词概念的小问题,而是对它的内在特点进行认识的关键性问题。所以,本书虽然主要针对变文的传播进行研究,但仍然有必要对变文的称名及渊源进行梳理。

第一节 变文的称名

变文的称名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如何认识和理解变文、变文的形式类型、每一类型的体裁有何特点等一系列根本性质的问题。变文称名问题的不断完善,体现了变文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

变文的称名问题从敦煌遗书问世之初就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和争论,但是由于当时能看到的原卷不多,所见往往为辗转传录之残篇,再加上这些遗书本身就不是有系统有计划的收藏,其中的变文作品在量和面的代表性上,更会有相当的局限。又因为过去文人一向鄙薄民间文艺,对其少有传述记载,所有这些都给早期的研究者带来了不少困惑。早期研究者对变文的称名多按个人理解,如王国维称之为“七字唱本”、“唐人小说”;^①罗振玉、徐嘉瑞称之为“佛曲”;^②陈寅恪称之为“因缘曲”、“演义”;^③陈垣称之为“俗

① 王国维:《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载周绍良、白化文:《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 罗振玉:《敦煌零拾》,上虞罗氏铅印本,东方学会1924年。又见徐嘉瑞:《敦煌发见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文学周报》99期(1925年)。

③ 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本1分(1930年)。